

失落的文明

广东省普通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

——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

郭小东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失落的文明

——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

郭小东 王海 周伟民 周建江 高泽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文明:史文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郭小东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307-10357-3

I. 失… II. 郭…[等] III. 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海南省
IV. K28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622 号

责任编辑:张 璇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 字数:212 千字

版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357-3/K·599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
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新批评”丛书·总序

郭小东

批评即选择。选择本身是一个批评批判筛选的过程，它在扬弃中肯定着主张着并建设着。故它着眼的不是破坏、颠覆而是寻找其价值与意义并从正面对之进行疏引和建树。中国古代文论的点到即止，并未在形式上延伸，从而给意会与想象预留下足够的空间，想必也正是“批评即选择”这个既定目标及其方式所设定的边界。它同时也体现了批评对其对象的尊重及有限保留。这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贴切文学创作与思维的特殊规律，包括文学对人心对其操作方式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的深切了解，而后做出的基本姿态与判断。这种基本立场，与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相比，它所包含的鲜明的对抗，等级关系以及诸如对世界的基本把握善／恶、肯定／否定、本质／意外等这类基本模式，凸显着一种自觉地逸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这种自觉精神，包含着强烈的现代性意味。类似当下的解构主义批评。

解构主义批评作为新批评的一种范式，是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

维的全新体验，是一种结构消解式的批评；它的对立面或说主要批评对象是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其基本观点和立场，主要来源于雅克·德里达的三本书：《论文字学》、《语音和现象》、《文字与差异》。它们同时出版于1969年，开启了解构主义运动的纪元。

解构主义运动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广义上，它指的是一场超越文学批评的运动；在狭义上，是指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学派的解构主义运动。“解构主义也许是在文学批评史上最具有理论倾向和最具哲学性质的运动”（德·曼《后哲学文化》）。它的核心价值可说是对批评教条的解构。解构，也即消解结构。尽管迄今为止，解构主义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严格说来，尚有许多未及厘清且含混的地方，有叙说不清的问题，但是，从宏观的价值评判上言，其基本立场与主要精神倒是十分恰合近现代性对文学及阅读乃至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需求，对复杂丰富吊诡的现代生活及精神现象。解构主义批评给出了一个药方并提供了批评思维的或然性想象。

所谓新批评，既不囿于某种批评模式的规范，自然也就不给自己自设边界。这里的所谓新批评，是建立在批评即选择，选择即筛选原则上的批评。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觉意识，并努力对固定、僵死的文学批评观念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突围，是以对象为媒介为材料而尽力耗散、辐射其艺术与精神存在的文学批评。自然，也不得不首先考虑对对象的现象及结构的消解。

关于解构的含义，西方有多种解释，更适合于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批评目的。即“分解”，而不仅仅是“摧毁”或“破坏”。它是对保守主义的动摇并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基本立场有益于开拓创新并对传统质疑。

其实，解构批评是一种哲学行为，是文学批评的价值观体认。是

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及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和解。它并非因为哲学立场及其主张而远离文学及文学批评，相反，它将文学及其批评置于一个无边玄思的哲学范畴之中，使其文学话语呈现一种足够丰富深谙人伦的状况。文史哲的合围，是文学批评真正实现对文学的有效统制的价值所在。美国女批评家巴巴拉·琼生说：“解构不是破坏的同义词。……一个文本的解构并不是去胡乱怀疑或随意颠覆，而是小心翼翼从文本本身抽出相互为敌的指意力量。若解构阅读中有任何东西被摧毁了，它不是文本，而是一种指意模式对另一模式毫不含糊的统制要求。”（《批评差异》）消解就是一种对对象的追寻与追索，从而发现文本的非逻辑因素，在文学迷宫中寻找批评清晰的路径，以轻取目标。

“新批评”丛书收入的12本书12个选题，它们都不是什么全新的异质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包括知青文学，都是经年累月的文坛旧说。但是，旧说并非意表着过时，它们中间隐藏着许多未及追索或在穷追之下已见麻木但却风光在前的问题。比如知青文学，目前既是显学却又存在着无尽的误读与隐匿。即便在概念上的迷乱与解释上的浅表，都非一般的泛泛而谈所能决断。故在这套书中，关于知青文学研究的，就有7个选题之多。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方向对之解构。

其他几个选题，也适切解构精神的要求，分别从文史哲的学科层面展开阐释。《艺术魅惑》、《文学肌质》等，都逼近近年学界或倡导或新进的学术前沿。

模式与方法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价值观是更为重要的。

2012年6月12日

自序

1976年8月，“文革”尚未结束，我被分配到广东民族学院任教，学院地处五指山腹地通什镇。那时，山城的气氛很紧张。谁也不知道，两个月后，“四人帮”将被打倒，中国将翻开新的一页。

初来乍到，终日无事，我便终日流连于学院的图书馆。图书馆藏书数量不多，仅十几万册，但关于民族研究的资料却算得上丰饶。这些资料大多是作为批判学习之用。有一些是研究机构自行译出油印成册的。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是诸多油印本中最吸引我的文本。也许是身处海南岛的缘故，史图博书中的描述似曾相识，它们和我曾经生活过的黎村苗寨的见闻与经验十分亲缘。从开始的好奇吸引到对这位德国人及其著述的热爱，期间仅只一瞬。一个计划便油然而生。

我找到自治州文化馆的张跃虎，他是一个诗人，又喜欢写些民族乡村典故风习的小品文。我想他对我的计划应该会有兴趣。我打算沿着史图博当年走过的路线行走，进行一次相似的考察。这个计划没有更深入的预期与策略。我是一个从小就渴望冒险渴望在路上行走的人。15岁到海南岛插队，也仅仅出于远走他乡、行万里路的简单梦想。张

跃虎很是赞同，他也是一个心里很不安分的人。但是，一个月后，我被派往自治州的东方县，成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团的一名队员，并被告知此去为期八个月。重走史图博之路的计划暂时搁置。

之后的八个月里，中国发生了惊天巨变。十月，“四人帮”垮台。我们是11月23日在东方县感城公社工作团的大会上，听到中央文件传达，并被告知不能外传。从工作团回到学院之后，77级新生入学，我当中文系班主任，并有大量教学任务。计划又再度搁置，但这个想法从未泯灭。

1979年，我和民族学院的杨清院长（黎族），随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毛星先生团队到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毛星先生把关于黎族四套集成的任务交给学院，学院责成中文系具体负责此事。此后三年间我便领着77级中文系的几十位同学，在自治州八个县境内，进行黎族民间故事、歌谣、神话、传说的收集整理工作。《海南岛民族志》成了我研究工作的指南……三年下来工作成绩斐然，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四套集成的工作任务，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包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黎族民间故事选》，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黎族民间文学概况”，《中国大百科全书》黎族部分条目，以及几大本自行整理油印的黎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歌谣的原始资料。我也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撰稿人。那时，我仿佛已经走近了史图博。

在大学工作，很讲究学科专业性。我的研究与教学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及历史研究便处于业余状态。直到2007年，我被委以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多年以前的夙愿似乎复燃。而此前一次偶然际遇，敦促我应该马上动作起来，否则终将成为大憾。

那是几年前的一次偶遇。白沙县的作者董元培邀我们去参观山里

黎村。在村中与一老者叩谈，他居然是史图博当年活动的见证者。我请他细细讲述当年目睹史图博进村及在村中活动的详情。他并不连贯的描述，却让我串连起史图博许多鲜为人知的活动。那时我的兴奋可想而知。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史图博于1931年、1932年两次进入海南岛，每次在五指山、黎母山、雅加大岭徒步考察至少二个月以上，沿途进入无数村庄。黎族是一个长寿的民族，当年十岁左右的孩子，现在至少有80来岁，但健在的应该为数不少，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力寻找当年的目击者，这是一个宝贵的机缘。我一边组织研究团队，申报重大科研课题，一边频频进入五指山区，沿着当年史图博考察的路线，寻找村落里的目击者，凡有80岁以上的老者，都是我们采访的对象。

在我们现场实录的视频资料里，至少有五位以上的当年目击者。他们的年龄在85~95岁之间，他们的记忆依然清晰，破碎的讲述终于为我们构建起史图博活动的影像。

又是三年过去，我们终于收获了这本关于史图博研究的著述和大量原始资料，包括一部初剪的长达6个小时的资料片。

史图博研究团队，囊括了现今对黎族文学及历史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学者。郭小东教授从青年时代起便在海南岛插队落户，与海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亲眼见证了45年来海南的发展变化，以及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逐步衰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文学研究功底。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从事这方面研究多年，现年近八旬，依然时常出没于黎村苗寨，不顾舟车劳顿、体弱多艰，著述源源不断。他们是最早关注并研究史图博的学者。周建江教授是古典文学出身，近年又倾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曾出版过《文革文学研究》，贯穿古今的文学理论见识与深入细致的现场考察，田野调查相得益彰，他对本课题每个关节的悉心研

究与梳理，有独到的建树。王海和高泽强是黎族同胞，他们都是黎族100多万人口中极为罕有的文科教授，对黎族历史与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在课题组里发挥了重大作用。郭蕤是课题组里最年轻的学者，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负责现场采录、视频、同期录音的工作。他的工作成果，丰富并保存了研究过程中的专业细节，并为未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最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原海南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学魁先生，在本课题研究期间溘然去世，英年早逝。这是团队的重大损失，他没能和我们走到最终，令人伤痛。正是他带领我们深入到乐东的黎族村寨考察，让我们在课题研究进程中不至于偏向。

关于史图博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仅对后来的研究者存留一些他们永远无法亲缘的东西。这些东西随着时间，会越来越珍贵地呈现它们的存在价值。史图博以他的学识和目光，记录并留存了黎族古老的原始的影像和某些精神的呈现。没有他的留存，黎族的历史文化便有所丢失。他留给我们几百帧这个民族不可复写的历史现场照片，并对之作了解，尽管对其注解我们可以不满意，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别的什么角度提出批评或批判。但正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把来自田野来自现场的调查，如实地保留下来，原始地呈现一样，这本身便是一种贡献与建设。做总比不做要好。

是为序。

2012年6月30日

目 录

“新批评”丛书·总序	／ 郭小东 / 1
自 序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史图博与《海南岛民族志》	27
第一节 史图博生平	／ 27
第二节 《海南岛民族志》	／ 32
第三章 黎族文身文化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45
第一节 白沙峒润黎文身的记述	／ 47
第二节 美孚黎的文身	／ 61
第三节 歧 黎 文 身	／ 68
第四节 哈黎(倅黎)	／ 71
第五节 对史图博关于黎族文身记载的简要学术评价	／ 78

第四章 《海南岛民族志》与黎族民间文学_____ 83

第一节 黎族民间文学概说 / 83

第二节 《海南岛民族志》与黎族神话 / 94

第三节 《海南岛民族志》与黎族民歌 / 110

第五章 史图博对黎族方言支系确定的贡献_____ 121

第一节 黎族的基本情况及其五大方言 / 121

第二节 史图博黎族地区调查前有关古籍文献黎族的记载 和分析 / 126

第三节 史图博黎族地区田野调查和黎族四大支系(方言) 的划分 / 131

第四节 黎族五大方言划分对后人的影响 / 137

第六章 史图博眼中的黎族宗教文化_____ 141

第一节 台方言(布配黎)支系的宗教文化 / 143

第二节 润方言(本地黎)支系的宗教文化 / 144

第三节 美孚方言(美孚黎)支系的宗教文化 / 149

第四节 杞方言(歧黎)支系的宗教文化 / 152

第五节 哈方言(倣黎)支系的宗教文化 / 156

第六节 黎族宗教文化的四个层次 / 159

第七节 黎族宗教文化的四个特点 / 161

第七章 在海南黎族山寨中穿行_____ 165

第一节 昌江县王下乡的杞方言支系 / 171

第二节	白沙县南开乡的润方言支系	/	176
第三节	五指山地区杞方言支系	/	202
第四节	三亚市回族	/	205
第八章	走向乐东黎族文化		217
第一节	走向乐东	/	217
第二节	乐东黎族文化分布	/	218
第三节	乐东黎族文化认识	/	221
附录一	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29年)——献给浙江的民族学		
	—— / 哈·史图博(H. Stiibe) [德国] 李化民 译	/	223
附录二	《海南岛民族志》	/ 薛姗姗 译	247
后 记			270

第一章

导 论

当现实成为学术问题，文明的沦落就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事关人类的生存及文化的命运。它最终必将成为人类未来遥远的记忆而使人类文明遗恨不迭。一个民族及文明的诞生，都曾历经千万年的沉淀与衍化，但它的消失，有时却仅仅只需要历史的一瞬，也许十年，也许百年、也许更短的时间。如果它的沉落与消亡，不是因为大自然本身的原因——诸如地壳变动、诸如山海移位、诸如气候、诸如疾病或天患，而是由人为因素造成，那么，这种对文明的扼杀或叫做在无知中的消解，便是人类对时间对历史对一切人文生成的漠视与践踏。

以上的联想与思索，皆来源于阅读并研究史图博著作《海南岛民族志》，同时也来自大量的田野调查与生存考量。我们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始，曾在黎、苗区生活工作，迄今四十余年，目睹半个世纪以来，黎族文化从原始生态向现代状况逐渐消解的过程，其间事象是触目惊心的，文明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自然也是非常脆弱的。事实告知我们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强势的政治舆论与同化的意图下是完全无力的。一个对外界并无多少戒备且本性开放的少数民族文化，是

很难抵抗现代化思潮及其生活方式浸淫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首先来源于自身对文化的敬畏以及外部对文化的尊重与致敬，这是民族文化得以自我修正与复兴的前提。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在关注与研究黎族民族文化的所有资料中，或说其研究思想中，这种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和传承，对之的充分致敬与尊重的主体意识，是很微弱的，或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由黎族峒主王昭夷所写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这本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著作中，这种文化遗失与陷落的忧患意识，也是微乎其微的。王昭夷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对保亭黎族地区若干黎峒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他本人还身体力行，在黎区开展了各种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大有以孙中山的开国大略为蓝本，对黎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做一系列实践性的调查与开发的势头。可惜这项工作包括他对黎族文化的学术建设，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而在刚刚开始时就结束了。但王昭夷作为黎族的第一位现代学者与实干家，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发出的声音虽然并不浩大，但其对黎族文化所承载着的希望——期望这个民族融入现代社会，并盼其文化传承有一种自我担当责任的宏愿，却无处不在地闪烁其间。可惜这个人的一生太具争议。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也还说不上是民族学专家，他本是黎族峒主的传人，又有土匪的成分，同时还有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的经历。在他之前，人们所关注关怀的更多是力求真实地反映这种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对之作较为真切生动的描述，似乎意在向外介绍或传播一种文明的状况，而无意于对一种文明的检讨与发扬。或有所张扬与褒奖，自然也难免有猎奇的成分，出于吊诡的心理，当然也就意涉了一种哲思渲染一种吊诡的智慧。诸如“黎人气习慁悍，与其同类一言不合，持矢标枪相向，有不可遏抑之势，若得妇人从中一间，则怡然而解，亦俗尚沿如

是耳”（《海槎余录》）。遑论这种俚俗的真伪，描状胜于探究是明显的。议决逊于描述，安于现状而少有深层的追究，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黎族文化调查成果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在现实的沦陷还不足以引起学术的重视且成为学术的时候，对之的客观描述本身就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贡献。

在文化史上始终自我沉默着蛰伏的黎族文化，它第一次以自己的声音发出钲鸣之声的，是王昭夷。王昭夷和现代革命史上许多显赫人物有同窗共事之谊，如林彪、周恩来等。他曾杀过共产党人，却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民族英雄，最后在日军严刑拷打中视死如归，壮烈牺牲。从另一个方面看，他奇异多艰的人生彰显并彪炳了这个民族的英雄气节和简单纯朴的民族性格，也包裹着这个民族心理中至今未被解读演绎的文化成因。从民族学角度来探究王昭夷，他本身既是对黎族自我膜拜自我剖析的文化建设者，又是一个丰富的可研究对象。他身上隐藏着的种族密码，至今未被完全解读。众多黎族研究者，对黎族种性与文化的探究与把握，亦仅止于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有限知识，以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通则，对之作一般化的人类学分类与分析，并未在灵魂层面上对这个民族有真正的吻贴。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进入黎区的学者大多与王昭夷有过接触，他们与王昭夷的几次交往、拜会，大多出于对这位闻名的有权势的黎族峒主的敬畏以便从中获取在黎区顺利调研的便利。他们并未把王昭夷当作研究的对象和学术同行，故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并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有用资讯。如果他们曾经把王昭夷当作同行来对待，也许他们之间的讨论与交流，将会是非常具有文史价值资源的。可能会给后来的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

史图博于 1931 年、1932 年两次进入黎区，其间从白沙牙叉、元门

经过潘阳进入五指山区，此地正是王昭夷的领地。而此时（1930年前后），正是王昭夷和共产党人（红军）交恶，他本人也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史图博何故与他失之交臂，待考。也许史图博未想过要与这位黎族头人相遇？他不知道此前这位黎族头人曾经有过有关的著述？否则，他应该是不会放过这等千载难逢的机会的。若史图博有机会和王昭夷交流，并有可能阅读王昭夷的著作，则他的《海南岛民族志》，也许会有别一种样貌。

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史图博，对黎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已经使他顿生一种文化遗存的危机感。他与众多外来的研究者，包括王昭夷等最大的区别，是他对这个民族文化遗产的极大担忧。他在《海南岛民族志》的“序论”中写道：“如果研究海南岛的人类学，就应该注意研究汉族（按日文原为“中国”——编者注）。两千年来，汉族文化从它的北部摇篮不断向南扩展，或多或少地同化了许多在人种上、文化上不同的民族，这个同化过程至今尚未终结。在海南岛，汉化过程还处在初期阶段。因此，我们在这里探究这一华南文化史的标本，可以进而说明整个华南文化史的发展过程。”

“汉族文化至今正处在变化之中，它吸收着欧洲的文化财产，许多古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着。活跃的南方超过了保守的北方，海南岛很快就要逼近巨大的迅速的文明运动。在没有全部失去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前，今天必须写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了。”

这样的言辞所包含的深重危机感和忧患，即使于今天的读者，也依然有着强烈的震撼。在当下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论证会上，类似这样震动人心的话语几近微弱无力。海南岛有关文化部门，近年间做了一些抢救工作，其侧重也仅止于文字资料的汇集，其成果是29卷的《黎族藏书》。这套藏书收集了自汉唐以来的大部分有关黎族的资料，